 热风 城市文化研究丛书
主编 王晓明

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

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

袁进 丁云亮 王有富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季风·城市文化研究丛书

主编 王晓明



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

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



袁进 丁云亮 王有富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 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 / 袁进, 丁云亮, 王有富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04

(热风·城市文化研究丛书 / 王晓明主编)

ISBN 978-7-80678-821-9

I. 身… II. ①袁…②丁…③王… III. 工人—文化生活—研究—上海市—20世纪50年代 IV. D412.7 G24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1221号

责任编辑 张玉贞

技术编辑 丁多

装帧设计 张志全

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

——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

袁进 丁云亮 王有富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25 000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78-821-9/G·77

定 价 28.00元

编者的话

中国这个庞大的社会,如急转弯的巨轮一般置身于忽而风平云止、忽而涛惊浪骇的大海之中,已经三十年了。当人们终于发现,这是一种至少二十世纪范围里人类从未见过的艰难曲折的社会变迁,它不但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已经——还将更为明显地——改变了整个世界,1980年代那种以为援用西方理论便可以清楚地把握这个变迁的普遍的信心,也随之消散。那些理论当然很不错,对我们有启发,但它们对于这个面目全非的新的全球世界——不仅仅是新的中国——的解释力,却也越来越显得有限。更重要的是,这广阔土地上的新的现实,以其变化的迅猛和前景的叵测,日益迫切地要求中国的思想和学术界,对它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甚至——说得严峻一点,作出清晰的描述。身为中国人,每时每刻感受到生活的变迁和压力,如果不能对这生活作出首先是自己觉得可信的解释,岂不是活得太冤?目睹中国的巨变日甚一日地影响整个世界,改变全球的未来,却不能以从自己角度展开的中国和世界研究,支援其他地方的同样对全球现实深感困难的同道,那也太令人羞愧了吧。

可是,无论对人对己,要想尽到身为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思想和学术责任,绝非易事。种种外部条件的限制,自不必说,因了各种内外

作用而形成的知识界、学术界的自身的孱弱，也早已称得上触目惊心。即以我较为熟悉的大学文科的情形来说，学科体系的老旧、心志的普遍的萎靡、从老师到学生的思想和学术兴趣的淡漠、认识能力的薄弱……都是人所共见，甚至已经开始令人熟视无睹，不觉得惊诧了。说实话，和这些比较起来，对中国和全球新状况的隔膜，对西方理论局限的迟钝，都要算是小事情了。而如果上述这样的情形不能较快地得到扭转，所谓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对国人和人类的尽责，就只是一句空话。

在我看来，199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逐渐形成的“文化研究”的热潮，根本的意义正在于，它从一个新的方面，表现了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对新的社会现实的敏感，和努力回应这现实的巨大要求的热忱。当然，要做的事情如此艰难，光有敏感和热忱是决然不够的。和“文化研究”在各地年轻学人中的“热”的程度相比，它的研究的实绩是太少了。但也惟其如此，为这样的新的研究的努力创造各种条件，就显得特别重要。我想，这一套“热风·城市文化研究丛书”的问世和生长，是不是也能在这“各种条件”的新地基上，砌进自己的一块砖？

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活跃的思想和学术活动，它一定没有未来，因此，能不能从各个方面激励这种活动，为它提供充分表达和交流的环境，就成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在当今世界长久立足的关键之一。我深信，这应该——而且也有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最后是一点具体的交代：构成本丛书的第一辑的三本著作，分别从纸面媒体、文学网站、工人的文化生活、街道的视觉和功能变迁等角度，分析当代上海的文化状况。其后还将有若干从影视媒体、流行服装、房地产市场及其广告等方面展开的研究成果，加入本丛书。不用说，这里的“当代”并非仅指当下，而是涵盖了1950年代至今、已经

超过了五十年的一段较长的时间。这里列出的大部分研究项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它们的作者要求我在这里特别说明。

王晓明

2007年11月 上海

绪 论

作为实践性概念的工人阶级,其发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15世纪时欧洲手工业工场的出现;而至18世纪后半期,以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为标志的产业革命的爆发,以及由此引发的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则是为其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步入政治舞台创造了绝好的前提条件。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抑或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无论是作为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都业已成为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结构,并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从世界历史来说,工人阶级具有自觉的阶级意识还不到200年,但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社会背景下,逐渐孕育萌生出了自己的组织——工会,并以此为枢纽,不仅用它来维护自身权益,还通过它进行阶级启蒙教育,乃至把自己的组织从工作场所发展到社会上,从事报刊、音乐团体、剧院等宣传和组织起政党形式直接管理国家,尝试着建立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关系。今天,尽管像产业工人的数量在下降,但作为一个阶级,它仍然被视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具有动摇社会根基的决定性力量^①。

^① 基姆·穆迪:《产业工人阶级并未衰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5期。

近代大工业产物的上海工人阶级,是随着外国殖民资本、早期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三种近代工业资本的产生而孕育、发展起来的。上海最早的产业工人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外国资本开办的企业中。鸦片战争发生之后,西方殖民者为了配合其在中国掠夺性贸易扩张的需要,首先在广州、香港投资设立船舶修造工厂;进入19世纪50年代,外国资本在华设厂明显集中到上海。其间,以洋务运动为背景的国内“官办”军事工业,30年间先后创办40多个工业企业,其中1865年在上海建立的江南制造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随着规模逐渐扩大,工人人数大量增加,1869年已达1300人^①。与此同时,民族资本创办的如缫丝厂、面粉厂、造纸厂、印刷厂等也相继在上海涌现。这些都为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据现有资料估计,甲午战争前夕,上海工业企业的人数约有37000余人,占当时全国工业工人总数的40%^②。虽然,按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企业规模不大,人数也不多,但在当初这却是应和了当时缓慢的改良运动及工业化发展的方向,并为引发其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浪潮做了蓄积的准备。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殖民国家因忙于战争,无暇顾及更多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民族工业遂得喘息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以后,虽然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动乱,但到1948年,上海全市的工厂数、工人数仍占全国50%以上。

共和国的成立,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界碑。它不仅意味着旧政权的结束,还意味着新型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理念的确立,进而使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人阶级被视为领导阶级,必然在规模、身份、权力方面,发生明显的变更。他们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教育诸领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南造船厂厂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

② 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以及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制度的运行,都不能不是引人注目的问题。从规模上看,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工业化的发展指标以及大幅度提升的就业率,促成工人数量连年迅猛增长。1949年上海市区职工人数为93.7万人,1952年为125.1万人,第一个5年计划时期又增加了39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8万人,1958年底职工人数达203.0万人,1959年职工人数为203.3万人,比1949年增加一倍以上^①;随着行政区域的扩大,郊县增多,1960年职工人数达285.95万人^②。

1949年以后,新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社会,这个新国家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中国拍摄的电影,片头上都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三个人物形象的组合,他们的形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但是这种组合不变。在这一组合中,工人是领头的,他的形象大都是钢铁工人,手握钢钎,帽子上有一副墨镜,这是产业工人的代表;农民是一位女性,似乎也是不变的,紧跟在工人身后,或者拿着镰刀,或者抱着麦穗;后面开始是解放军,手握冲锋枪或者肩背上了刺刀的步枪,这是“工、农、兵”的组合。这种做法是从前苏联电影学来的,这种组合作为片头一直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的中国,从50年代工人成为“领导阶级”,到90年代国企纷纷转轨,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工人的命运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中国工人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命运?50年代的工人是否真正成为领导阶级?如果成为领导阶级,他们的地位后来又是怎样掉下来的?如果本来就没有成为领导阶级,为什么他们又被作为领导阶级?他们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社会地位?需要我们重新梳理。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必须要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

① 上海市统计局编:《胜利十年——上海市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0—93页。

②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级专政”的国家,这是马克思提出来的,而且是被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作为他在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提出来的。根据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的建立,马克思创立了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构建了他的思想体系:“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①这也就是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出发,以大机器生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只有消灭所有的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是通向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必经之路。

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撇开工人与农民的比较,至少在城市里,工人毫无疑问是处在社会的底层。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缺乏文化,缺乏社会资源,怎样通过社会革命成为领导阶级,继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这无疑是一个问题。

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革命自然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根据儒家意识形态建立的社会层次结构,有着“士、农、工、

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商”的阶层划分,且“士”是作为社会的顶端阶层,处在社会文化、政治的领导地位,那么,在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在革命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工人在社会阶层的排列上,已经处在重要地位。“工、农、兵”,“工、农、商、学、兵”,都是当时革命媒体上常见的社会阶层排列次序,工人已在这一次序中位于首要地位。由此,在当时“劳工神圣”已是著名的口号,以至于,当时著名作家郁达夫也宣布他是脑力无产阶级,因为他同无产阶级一样,没有产业,依靠出卖脑力劳动为生。这本身就说明,当时郁达夫这一群知识分子,由于在观念中受到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重要地位,遂以厕身无产阶级为荣。这一社会阶层次序的排列是出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根据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因为他们在大工厂工作,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受剥削压迫最深,近代化的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具有最革命、最有组织纪律性、最大公无私的特性,因此,只有他们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也是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

然而,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毕竟是缺乏受教育的机会,缺乏文化,由他们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毕竟还是有着不少困难。列宁也早已指出,尽管在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工人阶级自发的争取经济、政治地位的斗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却是不可能由工人队伍中自发产生,而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创立,并灌输到无产阶级之中的:

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工

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及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①

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灌输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最初自然是由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随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增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层也就出现了工人。革命的无产阶级是由革命的知识分子用理论塑造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由工人阶级直接领导的,而是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都不是工人出身,列宁也不是,他们甚至都出身于剥削阶级,但是他们创立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他们的理论向工人灌输后,吸引了正在争取工人政治地位的工人阶级,组成或者加入了无产阶级政党,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②。翻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们可以看到: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过程,即先出现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又出现一批接受革命理论的工人,他们与革命知识分子一起,把自发的无产阶级争取经济、政治地位的斗争,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了自己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种状况无疑也蕴藏着一种危险,那就是革命知识分子完全取代工人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尤其是当无产阶级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无产阶级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第2版,第247页。

② 参阅列宁:《怎么办》,同上。

政党领导的时候。因此,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政党往往很重视工人在党员中所占的比例,在政党的领导成员中也很注意推选工人出身的党员作为领导,如即使是那些工人出身的党员相比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在能力上要弱一些,也能够成为领导人。

可是,工人出身者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就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社会底层的成员进入社会高层,例如美国著名的总统林肯也曾经当过伐木工人,也许可以算曾经出身工人,但是他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决定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则不然,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决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但是,理论上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是否意味着实质上的工人领导,这显然不能完全等同。在中国,1949年以后,在大陆就建立了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在当时社会的地位究竟如何?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工人”这个名词是中国社会使用频率极多的名词。然而,一直到今天,对于当代工人的具体研究,还是很少。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是怎样向工人灌输革命理论,怎样塑造工人的?工人的队伍是由哪些人构成的?他们的思想文化怎样?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些生活曾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便是本书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

需要指出:“工人”这个概念,现在已经用得很滥了。这个概念上的“滥用”,源于“文革”结束之后。建国17年发展到“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愈演愈烈,终于把知识分子打到“臭老九”的地位,在政治上成为社会的底层。“文革”结束之后,百废待举,国家的建设发展中心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转变为“建设四个现代化”,以“革命”

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需要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于是“文革”时期那种把知识分子打入社会底层的做法成为妨碍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的最大障碍，急需消除这一障碍。在当时，既能消除这一障碍，又不影响意识形态的体系，最容易的做法就是把知识分子算进社会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于是，便产生了知识分子是否算是工人阶级的热烈讨论，答案是肯定的。此后，“工人”的概念便不再按照“文革”前的做法，不仅是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经理总裁，甚至连大学教师、机关干部都可以作为工人阶级。按照目前的观念，似乎凡是加入工会的，甚至凡是拿工资的，都可以算是工人。于是，凡是在单位里工作的，都可以加入工会，都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这在“文革”结束时为了改变“文革”中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使“工人”这个概念越来越庞杂，它包括了太多不同的社会层次、社会阶层。假如运用这样庞杂的“工人”概念，我们就无法说清当代工人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本书尝试运用另一种工人概念：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夺取政权时期，共产党认为的“工人”指的就是在工厂生产第一线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人员，它并不包括在同一单位工作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他们被归为“职员”，因此更不用说其他的知识分子。中国现代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就认为自己作为作家，也是无产阶级，因为自己与工人一样，没有产业，只凭自己的脑力劳动混饭吃。然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认为郁达夫是无产阶级，而认为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国革命时期的这个“工人”概念其实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来的。本书将沿用这一“工人”概念，以说明当代工人面临的具体社会生活文化问题。因此，本书在探讨“工人”时，不仅不包括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甚至也不包括在同厂工作的管理人员和科研工程技术人员。

然而，即使是工厂的一线生产工人，差别也是很大的。按照 20 世

纪50年代笼统的分法,当时工人就有技术工、普通工、外包工、临时工四类,他们的待遇大不相同。技术工和普通工属于工厂员工的正式编制之内,他们享受工厂员工的正式待遇,如劳动保护、津贴、医疗等等。外包工不算工厂的正式员工,他们一般是由所属街道招聘,到工厂工作,他们享受工厂的劳动保护,但是不享受正式员工的工资待遇。临时工则是工作一天,享受一天的劳动保护,如果这天不工作,就没有正式员工的劳动保护,工资也是按天计算的。其实临时工和外包工往往从事的是工厂内工作条件最为恶劣、劳动量最大的工作,但是他们的人数不多,在工厂内的资料也比较少,因此本书论述的主要对象是工厂中列入正式编制的正式员工,即技术工和普通工,可能也会涉及外包工和临时工。

三

透视中国工人阶级的研究现状,当下的社会学领域对1978年后尤其是转型阶段的专题研究成果渐多,有一批优秀的社会学家参与其中,并且已形成热点,而对建国后30年工人的阶层构成、生活状况、文化经验的研究,或付之阙如,或只作为研究背景一笔带过。本书的目标是以20世纪50年代,即建国初期的10余年为时限,探讨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上海工人阶级伴随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动,如何利用集体主义的文化习得,重构新的阶级意识,相应地呈现出的崭新的行为动机、精神态度、价值信仰的表象,进一步推动社会机制运行的状况。

这一时期上海的工人与近代至解放前的工人,无论是来源还是身份,都有自己的特点。此前,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强行入侵与官僚集团为了挽救王朝的颓危应运而生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一直有部分破产农民转移到城市的现象,不过这种人口流动是被动的、零星的,未对社会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工业企业的创立,

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人口予以补充,自然地,破产农民转换成产业工人顺理成章,他们与城市里原生的店员、小贩、退伍士兵、无业居民、手工业者,成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受到工业技术类型与发展区域的制约,近代以降产业工人分布极不平衡:工厂工人大都集中在包括纺织业和食品业在内的轻工业,至于一般的机器制造、化学、冶金等重工业则很少。从性别、年龄格局分布看,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女工和童工占有极大的比重,像近代工业发展初期,练丝、棉纺织、火柴、造纸、卷烟等是颇为热火、流行的轻工企业,它们在技术上要求不高,普遍地使用着女工和童工,这样使得管理和薪酬都极易为资方控制,只要有少量的技术性工人便可投入生产,赚取更多的收入,只有印刷、铁路、机器等行业,才需要更多用于培训等技术性资金的投入。

新中国建立后,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模式,为了增强国力,重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于是城市产业结构有了较大的转换,人口的职业构成也因此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在上海表现得特别明显。以往,上海的人口商业及服务性行业职工所占比例较大,以至到建国以后产生了上海是一个消费性城市的错觉,当时政府的明确策略是力图将“消费性城市改造为生产性城市”,加之就业机会的限制,使得工人的产业人口分布出现大的调整。梳理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其间以阶级话语的宏伟叙事,逐渐建立起了共产党领导权威和各级人民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统摄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从公共领域到私人空间的生活内容。不过在上海市,因为地理位置、文化传统及工业水平的特殊性,还是具有一些有别于其他省份的历史脉络,像救助失业、劳力外迁、职工教育、工人新村等重大、特殊的事件,都影响着地域性阶级共同体文化的自我建构。

麦克法夸尔等人在撰写《剑桥中国史》时,以“革命的中国的兴起”命名这段时期。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阶层的转换,可以划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运行模式,1949—1957年基于新政权刚刚建立,中国领

领导人尝试着利用前苏联模式,通过基层政治动员的方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1958—1965年中国领导人为了更好、更快地解决中国的工农业发展问题,力图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由于建国初期社会和政体四分五裂缺乏整合力,公共秩序和风气长期无序运行已经败坏,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整个社会依然延续着之前松散、凌乱、多元的特征,这很难通过国家的力量聚合各分散的阶层,使他们融为一体转向新制度建设,于是,如何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合社会,便成为首要任务。

另外,共产党政权是从农村的胜利再转往城市的,城市的发展及现代化被视为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的主要标尺,而工人阶级虽然在理论宣传上被列为领导阶级,事实上却并未在过去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战争中起着比农民更大的作用。解放之前,在上海确实出现过由共产党人士组织、策划的工人罢工的抗议活动,诸如五卅运动、三次武装起义、保卫资产迎接解放等,都极好地体现了对新兴力量的期待和支持,但并不意味着铁板一块,否则就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对工人不能走向统一的困扰了。如果我们撇开党史研究的框架,不难发现,受原属籍贯、工厂性质、文化程度、价值观念的影响,他们对不同政党的态度也各有区别,换句话说,上海“工人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发展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①。所以,使城市工人具有阶级认同感,并逐渐集中到新政权的周围,就必须采取跟农村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宣传、教育,鼓励参与公共事务,特别是吸收下层、一直备受压迫的手工业工人,加入管理者的行列,并且以夜校、工会为组织单位,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和政治觉悟。

我们在研究时发现,贯穿整个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在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中,确实加入了多次像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乃至

^①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